

孔庆东 现象批判

曾 勋 著

孔庆东与于建嵘、万舟子、韩寒的大乱斗

与摩罗、司马南、贺卫方、
郭德纲、白岩松的恩怨情仇

知识分子的江湖，血雨腥风再现
少侠与醉侠论剑，究竟鹿死谁手



孔庆东 现象批判

曾 勋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原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庆东现象批判 / 曾勋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047-4258-2

I .①孔… II .①曾… III .①孔庆东—人物研究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6902号

策划编辑 李慧智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编辑 宋 宇

责任校对 孙会香 杨小静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原中国物资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5区20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52227568（发行部） 010-52227588 转307（总编室）

010-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 转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lp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047-4258-2/K · 0082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张 11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58千字 定 价 25.00元

序 言

和尚打伞

尽管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
来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伏尔泰

曾勋是一位青年才子，不久前在中国财富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思想是我的盐》，现在又推出这本《孔庆东现象批判》，让人非常高兴。

曾勋是一匹青年“黑马”，孔庆东也是我当年“草原部落”推出的黑马，只不过他现在已经变成了著名的“北大教授”和“孔和尚”。一提起孔和尚，首先就会让人想起一句俗语：“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是啊，孔庆东虽然曾经是我的朋友，而如今却变成了一名“无法无天”的“伪知识分子”和“流氓文人”，再一次让人感慨万千。

有人说过，“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我要对老孔说的是：“吾爱吾友，但我更爱真理。”曾经在“三妈事件”发生以后有广东媒体采访我，让我评价对孔庆东的看法，我说：“孔庆东的许多言行，不像一位北大教授，流露出许多流氓文人的江湖气息。”说实在的，老孔这个人有些时候还是非常有哥们儿义气的，比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要可爱得多，但他近年来的一系列话语却表现出他骨子里的草莽习气，让人对他的堕落非常痛心。

孔庆东一系列的语言暴力、战争话语无不流露着“文化大革命”的遗毒，他用一己的疯狂与偏执绑架了人民的“话语权”，既不符合法律的精神，也违反了起码的道德底线，是典型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正如曾勋在书中所言：“被流氓文化滋养大的人，灵魂始终带着洗不净的血腥味儿，

孔庆东现象批判

脑海里总残留着提着西瓜刀上街砍人的欲念。他们钟爱‘斗’的暴力文化，相信枪杆子里出美女、黄金和玉帛……可以窥见‘流氓政治’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中种下的祸根。”显而易见，孔庆东既是中国野蛮文化的受害者，也是灾害的制造者。

此外，孔庆东的成名和他在《47楼207》中所流露出来的“草根式的幽默感”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末有其积极的一面，和当年王朔的出现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的油腔滑调的调侃与美化苦难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精神贫血，甚至流露着“青楼余毒”和学术犬儒化的倾向。在那个难忘的夏天，当孔庆东的逍遥理想被专政机器碾碎以后，孔庆东变得非常麻木和绝望，不甘寂寞的他为了体现自己的才华，终于自创“星宿派”的“化功大法”，和司马南之流被誉为文化界的“四大恶人”。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剧作家易卜生说，文学是与自己的灵魂对话，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反思“孔庆东现象”的同时，更应该反思我们自身的文化。孔庆东与追捧他的那帮“乌合之众”无非是娱乐至死时代的文化傀儡，是普世价值洪流下的一股逆流，也是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某些“文化小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场“闹剧”。孔庆东早已不是他原来的自己，也不是哈三中当年那名朴实的文学青年，而早已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仿佛来自地狱的某一个地方，成为魔鬼和邪恶的代名词，但愿这本书能为他招回不死的灵魂。

是为序，与曾勋及孔庆东等诸位朋友共勉。

贺雄飞

2012年5月10日于北京



目 录

被 流氓文化滋养大的人，灵魂始终带着洗不净的血腥味儿，脑海里总残留着提着西瓜刀上街砍人的欲念。他们钟爱“斗”的暴力文化，相信枪杆子里出美女、黄金和玉帛，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他们的野心才会得到一丝满足。在孔庆东与他的粉丝集体高潮的背景下，可以窥见“流氓政治”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中种下的祸根。

第一章 言论批判——孔庆东“疯语”知多少

草莽文化造就语言暴力.....	2
警惕孔庆东的战争话语.....	6
孔氏文化血脉的传承与变异.....	12
一、砸掉孔老师的儒教场子.....	12
二、孔子湮灭了“后三千年的文明史”	14
三、《论语》：带血的“心灵鸡汤”	17
孔庆东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被“文化大革命”遗毒腐蚀的心灵	21
孔庆东绑架“人民”的暴行.....	26

孔庆东现象批判

解剖孔庆东的“反美”之心.....	30
一、药家鑫与美国的“个人主义”	30
二、孔庆东看美国大片的酸甜苦辣.....	33
三、把美国的问题留给美国人.....	37
谁把香港“割离”了内地	
——孔庆东骂香港人事件背后.....	40

贵族文人与游民文人循环登场的怪现象，造就了中国被帝王革命和草莽革命轮番轰炸的惨剧。一个国家的文化优劣集中体现在知识群体性格中，三千年的野蛮人“文明”摧毁了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人们既承受着兵荒马乱带来的疼痛与饥饿，又承受着知识层面的恐怖主义。孔庆东是受灾者，又是灾害制造者。

第二章 著作批判——孔庆东的纸上乌托邦

从草原部落“黑马”到“唱戏者”	47
一、贺雄飞与他放养的“黑马”	47
二、自我“剖腹”的孔和尚.....	49
孔庆东的“文学革命路”十八盘.....	52
一、《1921：谁主沉浮》中的“革命”文学	52
二、《国文国史三十年》中的“罪人”胡适	54
调侃与美化苦难背后的精神贫血.....	57
一、苦难面前的庸俗与崇高.....	57
二、“大跃进”看上去很美	59

三、老刘一家是被调侃致死的.....	62
现代性话语中的“青楼”余毒.....	66
一、迷恋青楼文化的“花和尚”	66
二、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人格.....	69
三、波伏娃与李莫愁的冰火两重天.....	72
武侠研究与学术犬儒化.....	75
一、披着“金学”外衣的犬儒.....	75
二、孔庆东炮制的“金庸牌奶粉”	78
三、金庸小说对孔庆东的人格感染.....	81
孔庆东之“汉奸”鲁迅.....	84

为了弥补先天性缺陷，傅红雪苦练天下无双的快刀，孔庆东则喜欢练杂七杂八的花拳绣腿，他总结自己武功包括语文八卦掌、现代文学六合拳、通俗文学扫堂腿、武侠连环套、金庸倚天剑、大韩民国疯魔爪、戏剧流星锤、大众文化一阳指、地域文化梯云纵、教育九阳真经、高考改革擒拿手、党史断魂枪、军事乾坤大挪移、毛泽东研究互搏术、宗教思想打狗棒、反腐倡廉蛤蟆功。几乎全是“花拳绣腿”，没有哪套功夫被他练精过。

第三章 人物批判——孔庆东的“敌人”与“朋友”

孔庆东与南方报系的“文化流氓”	91
不必在孔庆东与贺卫方中二选一.....	96
孔庆东、方舟子、于建嵘大乱斗.....	102
一、星宿派丁春秋之孔庆东.....	102

孔庆东现象批判

二、巨鲸帮麦鲸之方舟子	105
三、丐帮乔峰之于建嵘	110
赞郭德纲与批姜昆背后的秘密	113
白岩松以柔克刚“拳打”孔和尚	118
孔庆东与摩罗的双簧戏	122
孔庆东的“马前卒”张宏良	128
司马南的“庆东牌狗皮膏药”	132

历史太厚重未必是好事，美国人把历史当做垫脚石，所以他们望得更远；我们把历史当成包袱，所以我们举步维艰。将孔庆东拉到萨义德等人面前去做横向对比，固然有失偏颇，但即使在纵向体系内，孔庆东的言行也远远越过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底线。反思孔庆东的“暴力”“无畏”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反思自身的文化。

第四章 现象反思——孔庆东现象的危机与出路

娱乐至死时代的文化傀儡	139
孔庆东与他的“乌合之众”	142
知识分子、暴力革命及国家观念	147
一、秋天鸟托邦外面的弯刀	148
二、一个鸟托邦的自我覆灭	151
三、一个鸟托邦的涅槃重生	153
四、勿将“国家”装进套子里	157
跋 普世价值洪流下的反思与抉择	161

第一章

言论批判——孔庆东“疯语”知多少

以“北大醉侠”的称号进入文化界，如今以“孔和尚”的称号在网络上掀起阵阵阴风，孔庆东从“黑马”华丽转身，走上学术界“芙蓉姐姐”的道路。他深谙网络媒体的传播规则与部分网民的浮躁心理，以哗众取宠的夸张言行博取关注；他习惯套用红色术语，把话说绝说死。孔庆东如脱缰野马般疯狂地驰骋于他的江湖，公共舆论平台甘愿为他“搭梯子”，商业化的劲爆话语已经让他“走火入魔”。

孔庆东的江湖是暴力的残渣与凝固的血块堆砌起来的江湖，他的语言是“类人孩”充满阶级观念的暴力话语。其话语不仅是个人表述，更是站在文明碎片上的某个群体发出的杂音。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孔庆东不是无根的浮萍，其话语并非凭空产生，他身后，咆哮着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激流。

几千年来中国未曾有过和平变革的先例，游民与草莽无止境的争权运动，我称为“菜刀革命”。如今，知识上的恐怖主义如孔庆东的暴力语言、暴力思维沉渣泛起，便是“菜刀革命”的社会学演变。知识人与暴力亲密无间，一定是社会改进中某个环节出现了病变。

草莽文化造就语言暴力

本来应该在私人空间里爆的粗口，频频出现在孔庆东的公共话语中。他说：“少数汉奸王八蛋，就污蔑重庆在搞‘红海洋’……”辱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是“国际政坛一条著名的美国母狗”。他对“汉奸王八蛋”要“满门抄斩”“统统干掉”，对犯罪分子要“灭九族”。不仅如此，“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更是孔庆东的终极理想。

点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等公共事件时，孔庆东的愤怒与沸腾的民意相互推波助澜，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全民庭外“审判”。不否认民意的理性，但也不能否认其负面效应。信息不对称，普通人习惯在突发事件中表达久违的愤怒，迁怒于具体的被告，从而忽略了本质问题：一个靠民意左右判决的法律系统，究竟哪里出了毛病。孔庆东看清了大众情绪的非理性因素，借机大放厥词。

公众人物必须承受失去部分隐私的代价，出现在公共场合理应接受舆论的关注和监督，因为他的言行规范、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对社会起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作用。孔庆东虽处于公共状态，却无视规则，对流氓气质放任自流，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孔庆东的无畏与狂欢，反映出当下社会公共意识的淡薄；孔庆东的语言暴力，是草莽人格延绵了几千年的例证。学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一书中，对中国的草莽人格与流氓文化作了系统性梳理，将这本书与任不寐的《灾变论》结合起来读，几千年来不曾治愈的病灶一目了然。孔庆东的灵魂之舟，抛锚在了流氓文化的暗礁上。

长期以来，异常严重的自然与政治灾害导致国民丧失身份，流离失所引发了流氓的失败主义，包括对身份的过度敏感和焦虑、对家园崩溃

的悲伤和愤怒，以及对体制与价值观的极度怀疑、戏谑、嘲弄、仇恨和反叛等。有人制造暴力，便有人消费暴力。朱大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流氓主义，流露出了传统流氓文化的印记，散发出迷茫、呆傻、暴力、无聊、油滑（灰色幽默）、机智、自嘲、自虐和恶毒的浓烈气味，同时，它的反讽、戏仿、讽喻和寓言也解构了正谕话语体系，把它推向了荒谬的语境。”

被流氓文化滋养大的人，灵魂始终带着洗不净的血腥味儿，脑海里总残留着提着西瓜刀上街砍人的欲念。他们钟爱“斗”的暴力文化，相信枪杆子里出美女、黄金和玉帛，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他们的野心才会得到一丝满足。在孔庆东与他的粉丝集体高潮的背景下，可以窥见“流氓政治”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中种下的祸根。

古代每个朝代的建立，都经历过革命前期的密谋、革命中期的大屠杀，以及革命后期的“玄武门之变”。每个皇帝都像李世民一样，登基后屁股下面坐着哥哥弟弟们的脑袋。美国西部片双雄在决斗之前，一方恐吓另一方以占据心理优势时会说，我马上用你的头盖骨盛酒喝，李世民是拿自己亲兄弟的头骨盛酒喝。登基大典前的扫路运动不胜枚举，中国的官吏即是杀子弑父与亲兄弟相互残杀的暴力史。

北周明帝宇文毓即位后，授给自己的妻妹夫普六茹坚（杨坚）右小宫伯的官职，并进封为大兴郡公。杨坚的母亲吕氏在生他的前夜，梦见腹内苍龙盘绕，杨坚出生后，目如星斗，手上纹着“王”字。明帝想，兄弟父母都信不得，怎么能相信老婆的妹夫，何况这厮出生时有帝王之气，凭着上天的旨意振臂一呼，从者云集，我这位子哪能坐得住？于是，明帝派善于看相的赵昭去试探杨坚。赵昭很不厚道，拿主子的钱却替外人办事，估计他看出了杨坚眉宇间的帝王气，便欺骗明帝说：“此人不过能做到柱国罢了。”马上又私下对杨坚说：“您将来是要做皇帝的，只是要大肆屠杀一场，切记我的话。”赵昭这类历史缝隙的小丑，往往一句话能定乾坤。千万人头

孔庆东现象批判

落地后，杨坚顺理成章地建立隋朝，但他的死也成了悬案，后人猜测他是被儿子杨广谋杀的。

《隋书·后妃列传》中对隋文帝杨坚的死亡记载如同一部惊悚悬疑片。公元604年盛夏，“上寝疾于仁寿宫也”，杨坚卧病在床，心急的杨广认为时机成熟了，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御史大夫（相当于今中纪委主任）杨素，请教如何处理老爸的后事。杨素的回信被宫人阴差阳错地送到文帝杨坚手中，杨坚阅后气得吐了二两血，立即宣杨广入宫，接受审查。

没过多久，宣华夫人陈氏衣衫不整地跑到杨坚床榻前，哭诉杨广在她来的途中调戏她，杨坚这回气得估计肝都吐出来了，拍床大骂杨广是畜生。接着命人传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杨素得知这一消息，马上报告杨广，杨广早就在计划办大事，立即伪造圣旨，逮捕柳述、元岩，并将侍奉杨坚的人全部除掉。当天，杨坚死去。杨坚怎么死的《隋书》没说，给世人留下了无限猜想的余地。杨广即位后，立即假拟文帝诏书，把老哥杨勇拖出去砍了头。

唐代的玄武门之变几乎是前朝的另外一个翻版，屠杀—即位—屠杀—即位……所谓中国历史者，四字可概括之。酷刑般的历史仿佛一部部戏剧，国家与人民自编自导，芸芸众生皆为演员或看客，或参与其中，或冷漠旁观。人们在剧中颂扬暴力、使用暴力、消费暴力，在暴力的狂欢派对中，我们献上的是灵魂，祭祀那不死的传统。

民主社会的农民之子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成为总统，在专制社会却要通过暴力手段完成政治任务。最终，上层的暴虐必然会通过各种形式转嫁到下层，如焚书坑儒镇压异议人士，下令开挖南北大运河的政绩工程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没有读过四书五经的农民朋友可没那么多的“圣王”“天命”理念，随便在城乡接合部制造一个“篝火狐鸣”的合法性，滴几滴血在酒里喝完后碗一摔赤着胳膊就和兄弟们共举革命大业。

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又将中国划分成了两个社会：一个是由朝廷制定

律令、规范道德的社会；一个是由草莽控制的江湖社会，歃血为盟跟握手一样是家常便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两个社会相互代替的悲剧性描述。

在广袤的农村，流氓主义潜伏流窜在耕田、绿林和马背上，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发育为类似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集团，成则为官府，败则为草寇。这种流氓主义是东方专制文化与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必然产物，与生俱来，数千年难以根除。

柏杨先生经过考察，将中国文化定义为“酱缸文化”。他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越沉越多，越久越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一个巨大的酱缸，也是一个不朽的铁屋，屋里的人都在熟睡，醒来的人没有力气也没有利器来捣毁铁屋，活得比熟睡的人更加痛苦。因此对“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的民族主义宣言，柏杨颇有微词。他表示在感情上可以接受这种表述，但他更推崇另一个伟大的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他说，这个民族为世界文明建立了纲架，他们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司法陪审制度等，为人类社会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这是它对文明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再浪费的选举，总比杀人如山、血流成河要好。

江湖侠气稍不注意就和烧、杀、抢的流氓匪气画上等号。孔庆东体内缺乏抗体，被暴力文化和酱缸文化感染，脑子里自然不存在法治思想的一点影子。评价王立军主张“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记者的时候，孔庆东匪气十足地说：“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革命先烈，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像南方报

孔庆东现象批判

系还有野鸡网这些媒体首先就应该遭到起诉。”

虽不是权力阶层，孔庆东思维中却钉着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他最擅长乱扣大帽子的阶级斗争语言。评价章诒和女士《往事并不如烟》遭禁时，孔庆东敏感的神经意识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说这是“不容易到来”的“正义”，然后一顶大帽子扔了出去：“章诒和家庭所属的阶级是政权的敌人。”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可以轻而易举地置人于死地。

孔庆东们的高调表演与无畏裸露，无疑在发出这样的警示：如今还有很多隐形的草莽文化受害者，拾掇着酱缸底部腐烂的残羹冷炙。

草莽英雄固然有他两肋插刀、浴血战死的悲壮时刻，但类似洪门“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的侠气，在现代文明的重创中，只能流产出发育不良的革命模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68人是洪门中人。不否定他们的精神，但在开化了的成人社会里，草莽人格和社会实践一结合，只会多出几起“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行为艺术。

叶曙明先生的《草莽中国》一书深刻反省了“流氓政治”的弊病。民国时期不同地域的草莽组织对中国的祸害并非偶然，封建社会灭亡了，封建文化远未灭绝，民国继承的仍然是几千年沉淀下来的锈迹斑斑的衣钵。我们在看孔庆东的滑稽表演，铁屋子外面的人在看我们，屋里面的人都是草莽衣钵的天然传人。

警惕孔庆东的战争话语

孔庆东在《笑书神侠》中解释“武侠”的“武”字时说，“武”包含两个意义，首先你要有武器，然后你要放下武器。所以说，中国概念中这个“武”字，它本身就包含了战争与和平两个要素。而在孔庆东的话语中，处处彰显出他“有戈”的优越性，从不见他“放下武器”立地成佛的和平意识。使用战争语言，已经成为孔庆东的无意识行为。

“我觉得日本就一句话：欠揍！”

“日本不是要求我们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吗？我们提高给它看看，打一仗嘛，打一仗不就知道我们切切实实的战斗力了吗？”

“必须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要是再来一次‘黄海海战’，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日本国家自卫队，亚洲获得彻底的和平。”

“不是我们挑起战争，战争早就开始了，只是傻冒们不懂什么是战争，以为是美国大兵，端着枪，冲上我们的领土，才叫战争。”

和平年代时常有一群酷爱战争的疯子，离开“斗争”就如同鱼离开水活不下去，所以他们要幻想一些敌人出来。在他们眼里，美国电影是敌人的“糖衣炮弹”，看美国大片的都不是人；可口可乐是西方打的“文化战”和“生化战”，目的是用美国文化给中国人洗脑，弱化国人体质。如果荷枪实弹真的打过来，这类人要么马上夹着尾巴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么像周作人那样迫不及待地去当“华北政务委员会”理事。

学者林贤治指出：“长期以来，由战争培养起来的敌情观念和军事化作风对文化的介入，沿袭下来而形成了一种常态。”孔庆东迷恋战争话语与阶级斗争暴力言说的无意识行为，映射出中国战争文化的丰富多彩。

战争，彷徨于绵厚土地上的恐怖幽灵，千百年残忍而冷血地迫害着黎民百姓的肉与灵。《汉书·严安传》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形象地刻画出秦王朝犯下的战争罪行。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人，防匈奴用兵30万人，修长城用了50万人，造阿房宫秦皇陵用了130万人。这还是在相对和平的“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在“想坐稳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战争狂人犯下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中国古代作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战胜的一方把战败一方死者的尸体垒起来，用盖土夯实之后堆在道路两旁以示军威、威慑敌人。一堆一堆的死人形成金字塔形的土堆，叫做“京观”或“武军”。司马迁站在

孔庆东现象批判

历史的高度对京观表示否定，他认为作战双方没有道德优劣，不应该把对方的尸体堆积成京观。长平之战后，秦军统帅白起无法处理 50 万赵军战俘，便将其全部屠杀，把士兵尸体堆积为京观。后来，造反的项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曾“坑杀”襄城和新安的二十多万秦军战俘。一次性把几十万人的尸体垒起来，如此宏大的场面今天恐怕只能用工业光魔的特技才能还原。雄伟的人肉建筑的阴影下面，躺着“灿烂悠久”的文明。

汉代的王莽闹革命，将反对他的翟义、赵明、刘信全部“坑杀”，其亲属也不能幸免。魏晋南北朝时期，后赵的开国君主石勒带兵进攻河内冠军将军梁巨，梁巨兵败请降，石勒不许，最终坑杀一万多降卒并杀死梁巨，所谓“坑降卒万余”。类似“坑士卒一万六千”“坑士众万五千余人”的记载在正史中多如牛毛。

这些血的记载成为了汉语言史学特有的奇观，说明我们从婴儿文明时期便钟情于暴力与杀戮。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的封闭性，通过武装革命打下的新王朝很快从内部腐烂，随后农民揭竿而起，重新洗牌。每一次“城头变幻大王旗”，总伴随着一次残酷的文化灭绝运动。文化的连续性与完整性被权力欲望摧毁，本土支离破碎的“修身”“仁义”等东方话语，和拿来的“科学”“民主”等西方理性话语，在专制极权的无度纵欲下被夷为平地。

战争思维经过沉淀，在和平时期反刍为各种暴力思维和战争术语。最可怕的不是拿着狼牙锤的武夫，而是独握大权且有文化的武夫。拿着狼牙锤的武夫在沙场杀人毕竟有限，但有文化的武夫制造的血案，有时会牵涉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有文化就知道文人的坏处，一旦与权力挂上钩，便有了发动“战争”清算文人的资本，没有敌人就制造敌人，没有阶级就制造阶级。